

居住空间、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 徐延辉 邱 啸

摘 要: 目前学界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关注较多,但对于居住空间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空间角度入手,探讨居住空间和社会距离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住房产权有利于增加农民工对“本地人”即城市居民这一身份的认同。居住的区位越靠近市区,越有利于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与农民工聚居形式相比,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混合社区更有利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社会距离会降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同时社会距离在居住空间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文章据此提出,我们要保障农民工拥有自己的住房,减少居住区位带来的机会差异以及尽量实行分散居住,同时要不断缩小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从而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 农民工; 居住空间; 社会距离;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402(2017)11-0127-10

一、引言

农民工进入城市,其生活空间和生活场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必须重新建立自身认同。布劳认为,流动的人口不能简单地抛弃旧有的角色属性和角色关系,但如果不接受或不建立新的角色属性,那么他们就不能适应新的位置^①。所以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意义。解决好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不仅有利于农民工自身的发展,而且有助于城市的发展与稳定。农民工在城市落脚必须占有一定的空间。对于农民工来说,居住空间承载着更多的意义,空间不仅仅是工作后休息的场所,而且也是实现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场所。身份认同的实现不仅需

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同时也需要重视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因此,居住空间、社会距离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成为本文的核心问题。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 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认同(identity)及其相关的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心理学家最早关注认同问题,主要是将认同视为一种心理机制,比如埃里克森认为认同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受,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受,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②。在社会学领域,关于认同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泰弗尔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把认同区分为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其中社会认同是指个人对他/

作者简介: 徐延辉(1965—),女,辽宁岫岩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与社会政策;邱啸(1989—),男,山东滨州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与社会政策。

她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他/她具有情感和价值意义^③。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行为不能单从个人层面来理解,要较全面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必须研究人们如何建构自己和他人的身份。社会认同理论在西方社会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在移民和族群认同问题上。

我国学者运用认同理论分析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主要关注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宏观的社会制度、微观的家庭和个人特质等因素,都会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社会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对农民工认同具有重要影响。陈映芳指出,农民工作为一个“农民”和“城市居民”并存的身份类别,是由制度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第三种身份^④。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身份认同也有影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会限制农民工的交往范围,阻碍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⑤。家庭因素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史毅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家庭团聚也是影响其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⑥。此外,消费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余晓敏和潘毅的研究发现,新生代打工妹希望通过消费淡化自己与城里人的社会差异,在消费领域实现其在生产领域无法实现的“自我转型”,追求一种更加平等、自由、有价值 and 受尊重的社会身份^⑦。

近年来,开始有学者从空间入手探讨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主要分析空间对社会融合的作用,而身份认同作为社会融合的高级阶段,空间必然影响到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比如,潘泽泉和何倩的研究发现,居住地类型对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居住在商品房小区以及郊区/集镇的影响力最大^⑧。通过文献梳理,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国内从空间视角研究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文献较少,同时对空间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存在不足,这就导致对变量的操作化不够清晰和全面;第二,学者对居住空间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影响机制探讨不够;第三,这些研究的数据只是涉及某一个区域,研究结论能否推广到全国范围仍然存在疑问。帕克曾探讨过社会距离与空间距离相互关系,并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受帕克的启发,本文尝试将社会距离这一变

量引入到研究中并利用全国样本来探讨居住空间对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

(二) 居住空间与身份认同

“空间”是一个与“时间”相对应的概念,用于表达事物的存在形式。齐美尔提出了具有社会属性的空间观,将空间理解为客观的物质环境,指出一般空间或空间性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并非空间,而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由心灵方面实现的划分和概括,具有社会的意义^⑨。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不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空间具有三重意涵,即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以及表现的空间^⑩。在列斐伏尔的启发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空间的社会学意义。比如,卡斯特指出,空间不仅是一个物质产物,而且包含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以形式、功能和意义^⑪。那么,居住空间具有哪些社会功能?居住形式对人们的身份认同有何影响?

住房使人们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邻居、社区、学校、医院、商店以及休闲设施等,赋予了居住区内居民广泛的社会意义,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模式,而这种生活模式又具有社会经济和社会身份地位的符号意义^⑫。住房对农民工及其家庭来说非常重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意味着在城市中拥有立足之地,意味着生活的稳定。由于住房在中国人的观念和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一个人(和一个家庭)才能在一个地方真正安定下来。由此我们提出假设1:

是否拥有住房产权对身份认同有影响,拥有住房产权比没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更加认同本地人身份。

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意味着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自己的居住空间,也有更大的机会实现身份的转变。然而拥有自己的住所并不一定意味着实现了身份认同,居住的区位也对身份认同产生影响,不同居住区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也不相同。澳大利亚学者 Blair Badcock 的研究表明,通过提高工资或减免税收来重新分配财富也无法抵消城市空间特征造成的不公平。市民的生活水平和家人的健康、孩子受教育和自我发

展的机会、享受文化娱乐资源的可能,以及参加社会决策和社会活动等等,有时不是取决于其努力和收入,而是取决于他住在哪里,所以居住地点对个人和家庭实际获得社会资源具有重要的影响¹³。不同的居住区位意味着资源获取的不同,可能获得发展机会和公共服务也不相同。在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空间结构呈同心圆模式,即居住区位越靠近市中心,公共资源越丰富,可以获得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因此农民工即使拥有自己的住房,但是如果住房区位偏远,同样不能获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福利。据此我们提出假设2:

居住区位对身份认同有影响,居住靠近市区的社区能够促进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减少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

居住空间的人口结构也是影响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19世纪末,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的理念初步体现了混合居住的思想。此后,盖迪斯的综合规划理论以及佩里的邻里单位理论也都体现了混合居住的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二战之后,欧美国家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在短期内建设了大量公共住房,然而低收入者的聚居导致了居住隔离,并引发了犯罪率增高、失业率上升和福利依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严峻的社会问题,20世纪70年代,新城市主义提出了不同收入、不同种族的人群混合居住的思想。自此之后,混合居住在欧美国家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手段,迅速得到推广。欧美的实践表明,混合居住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效应¹⁴。比如,Feins和Shroder对五个城市的研究发现,MTO(Moving To Opportunities)计划对安全、邻里质量有积极的显著影响,虽然该计划也存在一定问题,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¹⁵。因为混合居住意味着空间隔离的减少,混合居住为不同群体提供了更多的沟通与交流的机会,有助于不同群体相互理解,减少隔阂。而农民工大都倾向于与自己的老乡与亲戚住在一起,这样原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可以得到维持,但是农民工与市民交往的频率就会下降,由此我们提出假设3:

居住空间的人口结构对身份认同有影响,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混合社区,更有助于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

(三) 社会距离与身份认同

塔尔德首先提出社会距离这一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表示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因此,最初这是一个充满客观性色彩的概念。帕克用社会距离来衡量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为社会距离给出了具体定义:“距离是一种可以测量表现个人和一般社会关系的亲密程度和等级……感觉上的距离可以像智力一样得到测量”¹⁶。博格达斯认为社会距离是“能够表现一般的前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征的理解和亲密的等级与程度”¹⁷。此外,博格达斯专门设计了社会距离量表来测量这些关系的等级和程度。

当前,很少有学者探讨社会距离与身份认同的关系。闫伯汉通过对东莞市的农民工进行研究,发现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小的农民工,融入程度越高,即身份认同和社区归属感程度越高¹⁸。陈延秋和金晓彤认为社会距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有负向影响,心理资本通过对社会距离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融入¹⁹。潘泽泉和李挺以湖南省的农民工为例,研究发现,社会距离越小,农民工越倾向于认同自己为城里人;社会距离在社会资本、同群效应等因素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起着中介作用²⁰。社会距离越大,意味着农民工在主观层面与市民越疏远,越容易产生敌意,也不愿意与城市居民进行互动,这样势必会降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4:

社会距离越大,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程度越低。

虽然社会距离受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居住空间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但是社会距离也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对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甚至也会影响其他因素对身份认同的作用。根据群际接触理论,对立群体的成员在恰当的条件下进行接触,可以减少群体之间的敌意并形成积极的外群体态度²¹。Pettigrew将群际接触的主要作用机制总结为增进了解、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三个方面²²。因此,居住空间的接近有利于农民工与市民的沟通和了解,从而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但是,奥尔波特指出,单纯的接触并不能克服偏见,他将促成积极接触的最优条件归纳为四条:第

一,接触双方要保持平等地位;第二,设立接触双方均积极努力才可以达成的特定目标;第三,接触双方在达成共同目标过程中处于合作而非竞争状态;第四,接触双方需要获得官方、法律、道德规范、社会传统对群际接触予以支持和鼓励。所以,空间距离上的接近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实现身份认同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居住空间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社会距离的影响。就农民工而言,与市民相比,由于社会地位较低,并且经常受到社会排斥,这会增加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如果社会距离过大,居住空间越接近,越有可能增加彼此之间的误解,降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因此,本文将探讨社会距离是否在居住空间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5:

社会距离对居住空间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管理司自2014年开展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本次调查以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3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本研究使用的是该调查的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个人问卷。调查对象是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流动人口,总共获得15999个样本。由于农民工的概念与流动人口的概念并不一致,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户籍和产业两个角度来界定农民工,即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户籍人口。经过筛选后,获得13655个有效样本。

(二) 变量测量

1. 身份认同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身份认同。本文比较赞同王宁对身份认同的定义,即身份认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自己属于某一社会范畴或群体的自我意识及其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认可,是人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位置、角色、形象和

与他人的关系的性质的接受程度²⁹。本文用“您认为自己是本地人”和“您认为自己是农村人”来测量身份认同。

2. 居住空间

居住空间应该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理解,不仅仅指农民工的住房,而且包括其周围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本文从三个方面来测量居住空间:住房产权、居住区位以及居住空间的人口结构。住房产权用“您现住房属于下列何种性质”来测量,租住单位/雇主房、租住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和政府提供公租房、单位/雇主提供免费住房(不包括就业场所)、借住房和就业场所表示没有住房产权。已购政策性保障房、商品房和自建房表示拥有住房产权。居住区位则用“您目前居住在什么样的社区中”来测量。按照居住区位,将居住社区分为四类。别墅区或商品房社区、经济适用房社区和机关事业单位社区属于市区商品房、保障房或单位社区。未经改造的老城区和城中村或棚户区属于市区城中村或老城区。工矿企业社区和城郊结合部则属于城市近郊区。农村社区则是城市远郊区。居住空间的人口结构用“您的邻居主要是谁”这一题来测量。农民工的邻居若是以外地人即流动人口为主则属于聚居,如果以本地市民为主或本地人与外地人比例相当则属于混合居住。

3. 社会距离

博格达斯认为社会距离可以用来衡量群体之间的关系和亲密程度。社会距离通过以下五个问题来测量:“我愿意与本地人共同居住在同一个街区(社区)”“我愿意与本地人做同事”“我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我愿意与本地人交朋友”“我愿意自己或亲人与本地人通婚”。答案包括“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四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4,为了便于分析,本研究对其反向赋值,然后进行因子分析,KMO值为0.880, $P<0.001$,并提取出1个公因子,解释方差达到73.13%,将其命名为“社会距离因子”。

4.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收入。男性赋值为1,女性为0。未婚赋值为0,其他几种情况为已婚,赋值为1。在教育程度方面,未上过学和小学合并为小学及以

下,并赋值为1,初中赋值为2,高中赋值为3,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以上合并为大专及以上,并赋值为4。年龄是连续性变量,由调查年份(2014年)减去出生年份获得。本研究的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基本情况

变量	百分比	样本量
性别		
男	54.9	7494
女	45.1	6163
婚姻状况		
未婚	25.8	3518
已婚	74.2	10139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0.4	1417
初中	55.4	7572
高中	24.8	3384
大专及以上	9.4	1284
住房产权		
拥有住房产权	7.7	1048
无住房产权	92.3	12588
居住区位		
商品房、保障房或单位社区	19.9	2723
城中村或老城区	28.8	3935
城市近郊	20.0	2738
城市远郊	30.3	4143
居住空间人口结构		
以本地人为主	19.9	2724
以外地人为主	44.9	6127
比例相当	29.3	4001
	均值	
年龄	32.5	13657
收入	3711.84	12680
社会距离(标准化)	17.96	13655

四、研究发现

(一) 农民工身份认同现状

本文借鉴了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的二元矩阵模式,根据回答的结果进行交叉分类,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分为四种,即同化型、隔离型、融合型和边缘型。同化型认同是指认为自己是本地人,隔离型认同是认为自己是农村人,融合型认同是指认为自己既是农村人又是本地人,边缘型认同则是指认为自己既不属于本地人也不是农村人。通过分析发现,这四种类型都占有一定的比例,认同自己是农村人的比例最高,达到74.4%,认同自己既是农村人又是本地人的比例是13.7%,认同自己是本地人的比例是6.3%,两者都不认同的比例是5.6%。由此可见,大部分农民工主要是认同农村人这一身份,王春光对温州、杭州和深圳三地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78.5%的农民工依然认为自己是农村人^[24]。虽然调查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和不同的区域进行的,由于所采取的抽样方式存在差异,所得到的结果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但是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民工在心理层面上真正融入城市还有一段距离。

表2 农民工身份认同现状

	本地人	不是本地人
老家人	融合型认同 13.7%	隔离型认同 74.4%
不是老家人	同化型认同 6.3%	边缘型认同 5.6%
N = 13655		

(二) 农民工身份认同回归分析

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所以本文采用了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在模型中,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可以分析因变量在各个类别之间发生转变的概率。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一特定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表3所列数据是logit模型分析结果。总共有四个模型,模型1和模型2的因变量是“是否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模型1只放入控制变量,模

型2加入了居住空间、社会距离以及两个变量的交互项。模型3和模型4的因变量是“是否认为自己为农村人”,模型3只放入控制变量,模型4加入了居住空间、社会距离以及两个变量的交互项。本文接下来主要报告模型2和模型4的结果。

在模型2中,在住房产权方面,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认同本地人身份的可能性是没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的2.325倍。居住区位方面,相对于居住在远郊区,居住在其他区位都可以增加农民工的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减少农民工身份认同的边缘化状态。具体而言,相对于居住在远郊区的农民工,居住在商品房、保障房或单位社区的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认同可能性增加72.3%。居住在城中村或老城区的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认同可能性增加17.2%。居住在城市近郊认同本地人身份的可能性比居住在城市远郊区的农民工增加34.2%。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社区的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可能性是居住在以外地人为主的农民工的2.107倍。同居住区内以外地人为主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外地人和本地人比例相当社区的农民工认同本地人身份的可能性增加35%,这表明混合居住会使农民工更加趋向认同本地人身份。社会距离则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负向作用,社会距离越大,农民工认同本地人身份的可能性就越低,社会距离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农民工认同本地人身份的可能性下降29.2%。就交互项来看,只有一个达到显著性,两个交互项的系数均小于0,这说明社会距离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意味着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社区对本地人身份认同产生的促进作用因为社会距离的存在而削弱了。

从控制变量来看,年龄越大,农民工越认同本地人这一身份,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大,在城市中待得时间比较长,逐渐接受了城市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另外,随着年龄的增大,经过长期的积累也有能力留在城市中。教育经历能够增加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与受教育程

度是小学及以下的农民工相比,受过高中教育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更有可能认同本地人身份,其可能性分别增加32.9%和44%,这说明较高的教育程度能够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有助于他们快速地接受城市的文化,逐渐认可市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在模型4中,拥有住房产权可以降低农民工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认同农村人身份的可能性比没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要降低45.7%。这说明拥有住房产权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居住区位方面,相对于城市远郊区,只有城市近郊这一变量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他两个变量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具体而言,居住在城市近郊会增加农民工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其可能性比居住在城市远郊区的农民工增加48.6%。同居住在以外地人为主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社区农民工对农村人身份认同的可能性要降低30.2%,居住在比例相当的社区则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社会距离会增加农民工的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社会距离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农民工认同农村人身份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2.2%。就交互项来看,只有社会距离与以本地人为主的交互项达到统计显著性,并且交互项的系数大于0,这说明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社区虽然可以降低农民工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但是社会距离会削弱这一作用。

从控制变量来看,拥有伴侣可以降低农民工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这可能是因为如果农民工在城市中有伴侣陪伴,有助于他们在城市中安定下来,愿意融入到城市中。受教育程度能够降低农民工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的可能性。与小学及以下的农民工相比,受过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认同农村人身份的可能性分别降低26.6%、39.5%和32%。较高的教育程度有助于农民工获得收入高的工作,增强他们留在城市的能力,使他们逐渐降低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

表3 身份认同影响因素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是否认为自己本地人				是否认为自己是农村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β	Exp(β)	β	Exp(β)	β	Exp(β)	β	Exp(β)
男 ^a	-.030	.970	-.020	.980	-.100	.905	-.111	.895
年龄	.017***	1.017	.011**	1.011	-.010*	.990	-.008	.992
收入对数	-.055	.947	-.065	.937	-.037	.963	-.034	.967
有伴侣 ^b	.147*	1.158	.066	1.068	-.299***	.742	-.221**	.802
受教育程度 ^c								
初中	.211*	1.234	.114	1.121	-.347**	.707	-.309**	.734
高中	.493***	1.638	.284**	1.329	-.590***	.555	-.502***	.605
大专及以上	.639***	1.895	.365**	1.440	-.499***	.607	-.385**	.680
拥有住房产权			.844***	2.325			-.611***	.543
居住区位 ^e								
商品房、保障房或单位社区			.544***	1.723			.026	1.026
城中村或老城区			.159*	1.172			-.023	.977
城市近郊			.294***	1.342			.396***	1.486
居住空间人口结构 ^f								
以本地人为主			.745***	2.107			-.359***	.698
比例相当			.300***	1.350			.033	1.034
社会距离			-.345***	.708			.115**	1.122
社会距离×以本地人为主 ^g			-.196**	.822			.239**	1.270
社会距离×比例相当 ^g			-.085	.918			-.109	.896
常数	-1.892***		-2.079***		3.331***		-3.199***	
-2LL	12543.065		11668.090		9080.571		8896.171	
Nagelkerke R ²	0.011		0.116		0.010		.038	
自由度	7		16		7		16	
观察值	12618		12618		12618		12618	

注: * p<0.05; ** p<0.01; *** p<0.001。

参照组: a. 女性 b. 未婚 c. 小学及以下 d. 没有产权 e. 城市远郊 f. 以外地人为主 g. 社会距离×以外地人为主。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 相关结论及讨论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并不是趋向单一的方向,而是呈现复杂的状况。同化型、隔离型、融合型以及边缘型四种身份认同并存,而且有较高比例农民工认同农村人这一身份,这表明农民工要真正

融入城市还有一段距离,身份认同的模糊会增加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使其产生各种对立的情绪,最终可能导致各种集体行动,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融合型认同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种状况可能是由于社会制度、社会网络以及消费等因素导致的。这种身份认同既可能是一种过渡状态,也可能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状态。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措施实现顺利过渡,这样就会成为一部分

农民工长久状态,这势必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而且由于这种相对矛盾的身份的存在,也可能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关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在现实中也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实现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通过对居住空间的关注,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政策措施来实现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在城市中拥有住房产权可以增加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降低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拥有自己的住房比其他居住方式更能增加身份认同^{⑤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住房具有重要意义,只有真正拥有自己的住房,才能减少漂泊感,“安居”才能“乐业”。朱磊指出,“居住的价值剥离”对农民工发展不利,即因居住不稳定导致个体难以积累地缘、业缘、信任以及社会支持等有价值的资源,难以融入社区并获得社区归属感,使住房只剩下空洞的物理形式^⑦。拥有属于自己的居住空间可以增强居住的稳定性,能够避免居住的价值剥离现象,有助于增加身份认同。对农民工而言,在城市中拥有住房,意味着有更大的可能获得城市户口,成为真正意义的市民,最终实现完整的公民权。谢若登指出,资产具有促进家庭稳定、创造未来取向以及增加个人效能等一系列福利效应。住房作为一种不动产,同样具有这些效应^⑧。拥有住房所有权可以使农民工在城市中不断积累自己的财富,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扩大交际范围,从而逐渐认同本地人的身份,最终融入城市。

良好的区位可以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不同的区位意味着享受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不同。良好的居住区位使农民工可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大致相同的服务和资源,可以进一步增进其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同时,居住在市区,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城市居民,逐步了解城市的文化和价值观,增加农民工的市民身份认同。区位的差异会形成马太效应,享受的公共资源越少,能力增长越慢,农民工的市民化之路亦会愈发艰难。国外的研究也证明,人们所居住的街区和社区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改善生活和实现向

上流动社会经济机会^⑨。较差的区位是与贫困、失业、福利短缺、较高的辍学率以及低收入等联系在一起的^⑩。农民工能否顺利实现市民化,最重要的在于自身能力的提升,良好的区位则是农民工获得各种机会提升自身能力的关键。然而,本次研究中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仅为3711元,绝大部分农民工根本无力获得区位较好的居住空间。如果不采取措施,农民工则会继续被迫生活在城市郊区或者城中村这些区位较差的地方,他们依靠传统的社会网络在这些区域聚集在一起,不断生产着以城中村为代表的农民工聚居的居住空间,这样的居住空间势必制约着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的转变。

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混合社区有利于农民工的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同时可以降低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褚荣伟等人认为,农民工与类似外来人群的社会交往越密切,越不利于形成城市认同;建立类似于“农民工之家”的组织或机构,其实可能更不利于该群体对城市的认同,相反,政府应该鼓励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进行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布劳认为人们在空间上的距离越近,则他们之间发生交往的可能性就越大^⑪。邻近增加了人们之间偶然接触的机会,从而会影响社会交往的可能性。与自己的老乡或亲戚住在一起,往往造成交往的内卷化,由于经历相似,难以接触到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同时也会产生居住隔离现象,造成社会排斥,最终强化对原来身份的认同。

社会距离会降低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增加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这与目前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社会距离越大,意味着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越疏远,不愿意与城市居民进行沟通和交流,这样难以形成认同感。此外,社会距离在居住空间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国外关于混合居住的作用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的研究发现也证明了混合居住确实存在复杂的情况,空间距离的接近并不一定能够促进身份认同,大卫·哈维就曾指出,“空间障碍的消除使地方性空间之间小规模、细微的差异变得

更容易被人感知和重要”^②。这说明不同特质的人群共同处于一个空间内,会使得一些差异更加清晰。因此,农民工与较多的城市居民住在一起,也会使得一些差异放大,由于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更容易受到歧视,甚至出现自我排斥现象。但就中国的现实而言,虽然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居住在同一空间内出现各种排斥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双方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悬殊,这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尤其是美国,种族因素是影响混合居住效果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只要农民工与所居住区内的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不过于悬殊,同时创造各种有利于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缩小社会距离,这样实行混合居住才可以促进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

(二) 政策启示

在现实中,虽然各地在努力保障农民工的居住权,比如重庆和上海的廉租公寓模式等,但政策的目标并不完全是帮助农民工获得住房所有权。从研究的发现我们可以认识到住房产权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住房政策的目标要定位于实现住房所有权,居者有其屋不仅仅意味着农民工有暂时落脚的地方,更要努力保证农民工逐步拥有属于自己产权的住房,使农民工有信心也有能力融入到城市中来,从而增加他们的身份认同。

要想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和实现身份认同,需要让他们获得实现自身发展的公共资源和服务。较差的区位意味着相对匮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比如很多保障房位置相对偏远,公共资源与就业机会相对缺乏,增添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难度。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一个手段,一个追逐利益的手段,一个实现资本的积累与循环的手段^③。但是,空间也可以充当实现融合的手段。城市规划学者可以通过对空间的改造来实现社会融合。政府可以把住房政策与城市规划相结合,将各种公共资源更加均衡地分配在城市的不同区域。此外,农民工作为一个能动主体,要让他们参与到规划的过程中来,实现作为一个公民而应有的权利。在保障农民工居住权的同时,避

免出现空间失配现象,使农民工享有平等的空间权利,增进其身份认同。

农民工集中居住会强化他们对农村人这一身份的认同。集中居住会造成居住空间分异或居住隔离,会拉大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因此应该尽量为农民工实现散居和混合居住创造条件。当然,居住在同一个空间内,并不意味着主体之间必然会发生更多的交流和互动,因为人们更倾向于同自己相似的人进行交往,所以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既有被动排斥,也可能有其主动排斥。研究的结果发现如果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过大,空间上的接近不仅不能够增进身份认同反而会降低身份认同,这也启示我们在促进混合居住的同时,需要采取措施降低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否则只是盲目促进混合居住,反而会产生更多的矛盾,最终也不利于实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因此,政府一方面要为农民工散居提供条件,营造公共空间,提供公共服务,减少被动排斥;另一方面也要提升农民工的主体意识,减少农民工的自我排斥。只有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力建设同步进行才能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使农民工真正实现市民的身份认同。

注释:

①布劳著,张黎勤译《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页。

②Erikson, Erik. H: Identity and life Cycle, New York: Norton, 1959, p118.

③Tajfel, Henri.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eds) Social Categoriz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mparison,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63.

④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⑤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⑥史毅《户籍制度与家庭团聚——流动人口流入地的身份认同》,《青年研究》2016年第6期。

⑦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⑧潘泽泉,何倩《居住空间、社会交往和主观地位认知: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1

期。

⑨齐美尔·盖奥尔格著,林荣远译《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60页。

⑩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 p26-33.

⑪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王志弘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⑫胡书芝、刘桂生《住房获得与乡城移民家庭的都市融入》,《经济地理》2012年第4期。

⑬张永青《“同质聚居、异质隔离”居住现象的反思与研究》,《中外建筑》1999年第6期。

⑭Musterd, S. Residents' views on social mix: social mix, social networks and stigmatization in post-war housing estates in Europe. *Urban Studies* 2008, 45(4): 897-915.

⑮Feins, J.D., M.D.Shroder. Moving to opportunity: the demonstrations' design and its effects on mobility. *Urban Studies* 2005, 42(8): 1275-1299.

⑯Park, E. R: *Race and Culture*.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1950, p87-88.

⑰Bogardus, E. S. 1925, Measuring social distanc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1925, 9: 299-308.

⑱闫伯汉《制度排斥、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社会融入——基于广东省东莞市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⑲陈延秋、金晓彤《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基于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青年研究》2016年第1期。

⑳潘泽泉、李挺《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州学刊》2017年第3期。

㉑Allport, G.W: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54, p537.

㉒Pettigrew T. 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8, 49(1): 65.

㉓王宁《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㉔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㉕韩俊强《农民工住房与城市融合——来自武汉市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13年第2期。

㉖褚荣伟、熊易寒、邹怡《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 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社会》2014年第4期。

㉗朱磊《农民工的“无根性居住”: 概念建构与解释逻辑》,《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㉘迈克尔·谢若登著,高鉴国译《资产与穷人: 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1页。

㉙Ellen J. G., M. A. Turner. Does neighborhood matter: Assessing recent evidence. *Housing Policy Debate*, 1997, 8(4): 833-866.

㉚Woo, A., Y.J. Kim. Spatial location of place-based subsidized households and uneven geography of opportunities: case of Austin, Texas in the US.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16, 47(1): 45-62.

㉛彼得·布劳著,王春光、谢圣赞译《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㉜孙逊、杨剑龙《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6页。

㉝列斐伏尔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孙菲)